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了一版商代晚期的殷墟甲骨，为迄今可知唯一的虎骨刻辞，历史、学术及艺术价值弥足珍贵。骨长22厘米，宽4厘米，一面雕刻精美繁缛的纹饰，分别有虎纹、饕餮纹、龙纹和三角纹，纹饰风格与商代晚期青铜器近同，并且还使用了镶嵌绿松石的工艺。另一面刻20字：

辛酉，王田于隹麓，隻大羴虎，才十月，唯王三祀昃日。(怀1915)

辞文大意为：“商王在在位的第三年十月辛酉日，也就是举行姁祭的那天，在名为鸡地的山林搞了一次田猎活动，捕获了一只大老虎。”辞文至简，但传递了三千年前的古老信息，而且时间、地点和人物三要素俱全，可谓是一篇很典型的商代“记叙文”。更有趣的是，简短的文字却又留下了神秘难解的谜团。

此版虎骨刻辞即属于商代晚期的记事刻辞，据甲骨文分期断代推测，这位王的身份是帝乙或帝辛父子中的一位，但到底是谁，学术界尚没有一致意见，研究者往往是各持己见。历代商王好田游，文献中相关的记载亦颇多，《史记·股本纪》“武乙猎于河渭之间，高雷，武乙震死。”《尚书·无逸》篇中有“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尚书·多方》谓帝乙之后的“商后王”是“逸厥逸”，南宋蔡沈《书集传》释谓“紂以逸居逸”，《竹书纪年》：“(帝辛)四年，大蒐于黎。”凡此种种，不再赘述。看来，从已出土甲骨和传世文献资料中，很难得到这位王是谁的正确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代文献记载的帝辛，比起他的父亲帝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有“帝紂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有“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剖比干，观其心”；还有“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可见，文献里的帝辛(商纣王)不尽是残暴和恶名，也有罕见的夸赞和客观的评价，这与现在人们眼中的暴君形象迥然不同。

鸡麓

甲骨卜辞中存在众多的地名，据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马盼盼博士整理，地名有615个，是十分丰富且珍贵的地理资料。卜辞田猎地是商代代

商代虎骨刻辞之谜

舒清运

名中的重要一环，对研究商代史同样不可或缺。据统计，甲骨卜辞中的田猎地名超过150个，像鸡麓这种地名后加“麓”字的，大概有30余个。

想要了解鸡麓，就无法回避商代田猎区的问题，对此有必要稍作介绍：有郭沫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沁阳田猎区”说；有董作宾、陈絮先生等认为的“泰山田猎区”说；有林泰辅、岛邦男为代表的殷商以北地区说。而郑杰祥先生则认为：商王的主要田猎区不在沁阳附近，也不在山东泰安沂附近，而是在商代王畿以东的古黄河两岸，其范围大致在今河南省濮阳市和新乡市以东以及山东省的西部地区。另外还有一些非专属田猎区之外的零星田猎地等说法。显然，各家所持田猎区的观点，大致是以安阳为中心，遍布于王畿以外的四面八方，足见商代田猎区问题的复杂性。

有关商代鸡麓的地望，历来有多种说法，现择其典型的意见作简单叙述。郭沫若先生曾指出，奚当即雞之省，春秋之雞泽。春秋襄三年，同盟于雞泽。杜注：雞泽在广平曲梁县西南(在今河北永年县西南)。李学勤先生将鸡地归于“沁阳田猎区”中的核心区域“孟区”，距榆三日程。陈絮先生认为，鸡地所坐落的范围西可以到济南市境，东面则至淄水沿岸，北面可抵古济水下游洛带，而南则能够进入今莱芜市一带。唐英杰、邹英都先生的晚商“畿内田猎区”说指出，鸡与孟、莒等地分布在商代黄河外侧，即今河南省滑县、内黄县、濮阳市等区域。马盼盼博士的论文《殷墟甲骨文所见地名的整理与研究》，收集甲骨文地名所见雞(奚)的材料12条，并结合所获动物种类及对地形环境的要求，认为从同版地名来看，鸡地应当还是在沁阳田猎区的范围内。由上述可见，鸡麓地望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商代田猎区争论的缩影。

甲骨卜辞中，捕获虎的地方除鸡麓外，还有窄斐、率、馮、机、衷等地，这些地点在甲骨卜辞中

存在同版或关联的地理关系，如果将这些地名系连起来，勾划出的地域也是比较广的，而且还有一个基本可寻的规律，那就是或在山脚下，或离山林较近，或为偏远之地。再结合虎的生活习性，它们有时将自身分泌物留在灌木丛中，有时在树干上抓出痕迹，有时在地上打滚，以这些标记来界定自己的领地，而将生存领地置于尽可能远离人类的地方，亦是天性使然。因此，综合起来考虑，这些捕获虎的地方大概不会分布在距离商王畿较近的地区，应该依附于群山之下更为合理。换言之，鸡麓大致位于太行山东南一侧的“沁阳田猎区”，或者是“泰山田猎区”范围内，显然要合适的多。

从地域距离来看，以安阳为起点，到山东泰安大约300公里左右，至河南沁阳大约200公里左右，这样的距离商王用做田猎地应该不存在问题。久远的不说，以清代为例，在北京的东北部承德设立木兰围场，两地相距已超过350公里，依此看来，距离肯定不是选取田猎地唯一考虑的因素。清中期以前，纵然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北方的蒙古仍然是清王朝的巨大威胁之一，清王室每年兴师动众不惜耗费金银财宝也要举行木兰秋狝，目的也绝不是为了游山打猎那般简单，更多还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考量，这与商代晚期的国家安全形势有相似之处。商代晚期，在东方有来自夷族反叛的强大威胁，这些从商王征夷方的卜辞中可见一斑。在西方，有日益崛起的周人的挑战，虽然形势未及东方那么紧迫，但安全压力终归还是存在的，而实际上也正是周人趁虚而入夺得了天下。可以想见，在面对不同时期不同方向的强大对手时，商王适时安排包括田猎在内的军事行动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虎骨刻辞

宰丰骨辞及局部、拓片

大羴虎

辞文“大羴虎”一句，过去由于文字释读或理解上的原因，有当指某种特殊品种之虎，有“大烈虎”，“大魄虎”，“大膊虎”，“大霸虎”等不同的说法，加之研究者一般是作引用的多，专门展开论及的少。刘钊先生在《安阳殷墟大墓出土骨片文字考释》一文中，引用这版虎骨刻辞时将羴作“羴”(霸=白)，并在注释中说明，“霸”字可以训为“强悍”，又可以借为“白”。金文中“既生霸”“既死霸”的“霸”字典籍中皆作“魄”，“魄”即从“白”声。

刘钊先生“大白虎”说的主要依据，除了对“羴”字的解读外，还在该文中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证。其大致的过程是，首先把包括虎骨刻辞在内的特殊的记事刻辞归纳起来，根据其许多相同之处，辅之以中国古代文献里的“记异”传统，证实了记事刻辞“记异”的属性。在此基础上，又通过甲骨刻辞里殷人对白色动物的重视习惯，与历代典籍中古人重视白色动物的记载互相印证，为“大白虎”之说铺平了道路。虽说刘先生有关“大羴虎”的考实内容，只是作为《安阳殷墟大墓出土骨片文字考释》全文中的一个章节，但所用材料之实，旁征博引之全，毫无疑问是至今为止最系统最扎实的。由此，“大羴虎”即“大白虎”，成为学术界比较主流的说法，也为很多研究者所接受。

但即使是这样，也有对此说持谨慎态度的。

“邺城论坛·2023”纪要

俞乐清 沈丽华

9月23日，“邺城论坛·2023”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临漳举行。为纪念邺城考古工作开展四十周年及庆祝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揭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日本金泽大学等国内外二十余所科研机构和高校的6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东亚地区古代都市考古与历史、中古时期佛寺考古与造像艺术、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运营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朱岩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指出：在新的学科要求下，新时代的古代城市考古需要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并加强方法论探索。城市考古始终要根植于田野一线，只有不断深化对具体遗迹现象以及出土遗物等一手资料的探讨，兼及文献研究，才能全面、立体、生动地呈现一个古代城市的概貌，宏大的时代叙事离不开城市考古每个个案的准确、扎实研究。最后，他也寄望中青年学者们要不断勇于探索，努力推进多学科方法运用与古代城市考古的有机融合。

在第一场研讨中，4位学者就古代城市考古进行了交流研讨。何利群代表邺城队回顾了邺城遗址四十年的考古工作并总结了近年新收获，包括东魏北齐邺城宫城、桃园北齐大庄严寺、曹村北朝窟址等地以及北吴庄佛教造像的修复展示等，同时概要介绍了北响堂石窟区域考古工作计划。贺云翱介绍了六朝建康城三十余年考古的主要收获、学术价值及遗产价值。张学锋基于中日韩学界对“官寺”等概念的探讨以及相关中文文献的爬梳，提出中国中古都城规划中“第一国家大寺”的概念，具体描述了刘宋建康大庄严寺、北魏洛阳永宁寺、东魏北齐邺城赵彭城佛寺等众多“国家大寺”在南北朝都城涌现的现象，并将其解释为佛教国教化的表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黄信介绍了元中都的位置、历史沿革、文献记载、考古工作成果及计划，强调了该遗址在金元都城城内官城布局研究、辽金元捺钵制度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研究等方面的重大价值。钱国祥对该场研讨进行了评议，认为四个报告中呈现的由南北朝至元代的都城发展延续性极具启发性。

第二场研讨聚焦石窟寺考古与造像艺术，由李裕群、龚国强主持和评议。魏正中着力于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理论和方法论构建的探讨，认为今后的探索方向需从窟内壁画和塑像转向窟外空间，重点关注木结构建筑等窟前现象，辨识寺院边界布局，从而复原整个寺院的情况、寺院与寺院的关系、寺院与城市的关系，使之变为一段历史的认识与研究。杨俊将隋唐舍利崇拜视作成形的制度而非仅是宗教现象，并详细考察该制度对七至八世纪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影响。解峰系统梳理了高句丽佛陀造像相关的学术成果，在此基础上甄别并重新确认高句丽历史疆域内发现的材料范围，明晰高句丽佛造像的形式特征，其演变序列整体呈现与北朝晚期中原地区佛像趋同的状态，并体现若干本土化特征，中原地区佛教物质文化的持续性导入是其演变动因，在高句丽的意识形态层面产生了深刻而持续的影响。

在第三场研讨中，朱笑言讨论了曹魏邺城和洛阳城城门、主殿的建制和命名、城市布局以

及中轴线等规划问题。郭晓涛回顾了北魏洛阳里坊的考古研究历程，提出要全面理解北魏洛阳里坊，需要进行道路系统的勘察和考古、里坊的考古发掘，并考虑佛教寺院的文献记载，以获取更多关于其布局和内涵的信息。石白社讨论了南北朝都城影响下的隋唐都城里坊，具体分析了里坊区路网结构、里坊空间尺度与形制结构、里坊内庭院的空间建筑形制等，指出古代居住理念追求将房屋、自然景观、农田、养殖等融为一体宅邸空间，隋唐时期的城市里坊制度受到里坊空间和国家管理的影响，具有独特特征，规划设计完备。卢亚辉从城市考古角度出发，推定唐代善善寺作为神龙政变之后营建的政治景观，只存在于东都洛阳一带。圣善寺的改建和扩建工程可能导致章善坊居民的减少。张学锋在评议中充分肯定了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强调考古、历史两个学科需要深度弥合，并指出草原民族传统对中古时期都城布局具有重要影响。汪勃指出对城市空间结构和布局研究也要充分考虑水土、风向等因素，并结合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进行探讨，从而加强理论体系及方法论方面的支持。

在第四场研讨中，王睿通过对扬州蜀冈古代城址六朝时期遗存材料的分析，推测六朝广陵城的城圈和城墙与汉广陵城基本相同，且基本沿用并修葺了汉广陵城的城门，刘宋时期新开了南城。张今通过对东晋南北朝官造建筑用砖在铭文、图案两方面特征的归纳，认为部分砖都从都城到地方呈现同化迹象，是考察这一时期匠作技术传播的重要物证。张效儒讨论了汉唐时期中国各地区瓦件的演变过程，他认为，从绳纹瓦件到素面、篮纹、磨光瓦件，瓦件制作工艺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变化与地域、政局和文化交流相关。陈斯雅以邺城和晋阳出土品为例，探讨了北朝后期铅釉陶的器类形制变化、器形与釉色的关联性、技术规格特征等问题，并强调了不同区域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贺云翱在主持评议时充分肯定了年轻一代学者所呈现出的高质量水平。

第五场研讨着眼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运营这一主题。陈波以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对新时代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方向提出思考，阐明了考古遗址公园是考古遗址还是博物馆的问题分歧。黎筱筱从文旅目的地视角对推进考古遗址公园与城乡建设、文旅业态、生态保护深度融合发展提出了建议。在评议环节，沈阳指出两个报告分别从文物保护工作的第一视角和文旅运作视角来展开，相辅相成；古代城市的认知除了考古人的专业努力之外，也需要城市规划、建筑学、景观旅游等多领域多学科专家的共同参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邺城考古队首任队长徐光冀先生在闭幕式上进行了总结讲话。他指出：城市考古必须具有自身的理念与工作方法，从大处着眼，有专人、有梯队地长期工作。城市遗迹中出土的砖瓦等建筑材料也非常重要，除传统年代、分期研究外，还可以借用古建、民族学、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的手段。有关佛教历史及艺术方面的研究，要注重外来宗教的本土化方面。对于遗址公园和文化公园，要妥善区分，明确概念和理念差异。考古学之所以受到重视，就是因为它能够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只有突出我们的特点、我们的传承，中华民族才能够兴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重庆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地下文物保护项目考古发现成果丰硕

本报记者 王龙霄

早期土坑墓，西汉中期土坑墓，东汉墓砖窑的同步发现，展现了从晚期巴文化到汉文化进程的一体化历史进程。其东周居址类遗存是乌江下游地区的重要补充，联系到乌江流域既有发现，基本贯穿起乌江下游巴文化从发生、发展到两汉一体化的进程。

天子坟遗址关口地点发现1座有“二年”纪年的西汉早期竖穴土坑木椁墓，出土陶器、铜器、漆木竹器等各类遗物600余件。该墓是目前发现的纪年最早的西汉墓，也是长江上游地区一次性出土漆木竹器最多的墓葬，其棺槨制度、随葬品等丧葬礼俗展现了高度的汉文化特征。

发现了乌江下游地区祭祀遗存新材料

生基坪遗址发现两座东周时期灰坑，两坑处于同时期遗存最高处，包含丰富的陶器、砾石块、木炭烬等。其中H14堆积分为三层，上层富含陶瓦、圆底罐等陶器，中层富含木炭烬及红色烧土颗粒，下层为中层与生土过渡浸染层。H14陶瓦、圆底罐置于木炭层之上，可能是东周巴人短期祭祀行为的反映，是东周巴文化类似遗存的首次发现。

促进了乌江下游地区手工业考古研究

大农场遗址出土有较多用鹅卵石和黑色赭石加工而成的石器，器型有石斧、石磨、石环、石核及石芯等，表明新石器时代此处可能为一处石器加工场。

生基坪遗址西部发现三期时期石灰窑2座，窑炉为长方形竖穴式，底部有“十”字形沟槽。槽内富含木炭，是燃烧后遗留，经木炭种属鉴定为竹亚科。该石灰窑与宋及以后的圆形窑不同，是石灰烧制和利用在较早阶段罕见的考古发现，对我国石灰烧制技术及其利用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生基坪遗址东南部集中发现一批宋代灰坑、灰沟、灶、排水沟等遗迹，出土大量夹砂陶钵类器物，可能与宋代陶瓷制造相关。

小农场遗址Ⅱ区发现一处分布面积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宋明时期冶铁遗存，发掘冶铁炉炉基6座、疑似矿石加工焙烧活动面1处、炼渣堆积1处，出土大量炼渣、矿石、石质鼓风机、炉壁等冶炼遗存。冶铁遗存可分为燃料加工区、生铁冶炼区和炼渣堆积区，展现了从燃料加工、生铁冶炼到排渣的冶炼工艺流程。该遗址是目前重庆发现年代最早的冶铁遗址，也是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同时期冶铁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处冶铁遗址。遗址内出土的6座高炉清晰地反映了冶炼过程所使用的鼓风机与排渣设计，特别是在鼓风机原位出土的石构件，是首次发现在冶炼过程中对鼓风机管进行保护的直接证据。

盐井峡盐业遗址地处盐井峡内，清理有盐井、石砌平台、盐灶、卤水坑、卤水坑、石路道、摩崖题刻等盐业相关遗迹40余处。该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配套设施齐全的明清时期制盐作坊遗址，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制盐生产链(输卤入池、泼炉印灶、掘灶制

陈絮先生就认为，过去学界多将羴字读为“烈”，新近刘钊先生释作“霸”，读“白”或“膊”，似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欲坐实，恐怕还有些难度。陈先生所指坐实的难度为何，他未加阐明，但很可能跟佐证的材料有关。

检视目前已有的甲骨材料，白色动物确属常见，据刘书芬先生统计，甲骨文中各类白色动物的辞例数为：白马5条、白牛20条、白羊4条、白豕14条、白鹿5条、白犬3条、白豕8条、白豚2条、白狐3条、白兕1条、白鹿2条。尽管以上数据还有补充的余地，但足以体现商代白色动物与众不同的事实，也说明了“殷人尚白”观念的可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既然殷人如此钟爱白色动物，唯独这版虎骨刻辞记载“白虎”时没有直接书写，这是很令人疑惑的。

从甲骨文语法的角度来看，似有可商榷之处。甲骨卜辞中，有黄牛(《合集》41400)，有黄牛(《合集》14315)；还有大星(《合集》11505)，新星(《合集》11488)，新大星(《合集》11503)等等，不采用小黄牛或大新星这样的语法文例。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张玉金先生曾在《甲骨文语法学》一书中有过很好的论述，即“定中关系”。由此规律推之，倘若当时商王捕获的是“大白虎”，似乎应刻写作“大白虎”为宜。但既然以“大羴虎”的语来表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究其原因，恐怕要从“羴”字是什么性质的形容词入手。

还有一点也不能疏忽，李宗焯先生《甲骨文语法》“霸”字条下收入两例，“霸”分别作羴(怀1915)、𠄎(屯0873)，从字形上看，两字皆有明显的省简，这种现象在甲骨卜辞中习见，是契刻者刻写文字时去繁从简的常用做法。依照此逻辑，契刻者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择刻写难度大的“羴”字，而放弃笔画简单的“白”字，是一个关键问题，也直接关乎“羴”字的含义。

综上述可知，到目前为止，虎骨刻辞中王、鸡麓及大羴虎等问题的研究都并非毫无争议，不过总的看来，与前两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比起来，“大羴虎”则相对简单一些，争议仅限于“羴”字的本义上。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卤、上灶煎盐)，展示了峡谷型盐业遗址的布局景观。

提升了多学科协同研究水平

全国9家单位参与了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地下文物保护的多学科研究，开展了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年代测试、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地理环境、有机质文物现场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通过对大农场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初步鉴定，确认动物族群以水鹿、麂、鹿、牛、猪等哺乳动物为主，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水生动物和软体动物，对研究乌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生业经济、生态环境变迁有重要价值。通过对信号台遗址东周至唐宋时期的1184件动物标本的鉴定，确认种属121个，包括家养动物羊、猪、狗、牛、马等，野生动物鹿、麂、鹿、水鹿等，爬行类动物龟、鳖，另还有鱼类和鸟类。

通过对信号台遗址东周、唐代的两份浮选样品进行鉴定，发现了粟、黍、水稻、大豆、绿豆、高粱、紫苏、野豌豆、狗尾草属、藜等16个种属400余粒炭化种子，确认信号台遗址东周先民是以种植粟、黍两种旱地作物为主。通过对菜坝遗址宋代浮选样品的鉴定，发现了粟、小麦、大麦、水稻、黍、大豆、燕麦、野油菜、马唐、硬草、拉拉藤、紫苏、葡萄属等炭化植物种子，推测菜坝遗址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多样，以种植粟、小麦、大麦等旱地作物为主，水稻也居于较为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菜坝遗址北壁汉代至近现代地层堆积的环境考古分析，提取孢粉4591粒，包括木本和草本植物、蕨类植物、藻类植物三类计56个植物种属，汉代以来菜坝遗址周围植被群落组成较为稳定，为在人类活动显著影响下生长的次生植被，汉代水塘堆积内环纹藻、光面球藻等藻类以及睡莲属等水生植物较丰富，显示该区域为水体，宋代地层禾本科花粉大量增加，表明人类活动强度大幅增强。通过对生基坪遗址东周时期灰坑H14、H17出土木炭鉴定，木材种属包括栎属、槭属、青檀属、楠属、竹亚科、安息香属、蕨属、壳斗科、散孔材等；通过对生基坪遗址两晋时期石灰窑Y2底部出土炭样种属的鉴定，确认其燃料为竹亚科。

通过对2个样品的碳十四测年，确定生基坪石灰窑的年代为两晋时期。通过对盐井峡盐业遗址周边开展地质环境研究，初步弄清了盐泉所在地区地质背景、盐泉所在层位及岩相、盐泉或矿条件及卤水矿物成分；对盐井峡盐业遗址开展遗址空间分析研究，建构了所在区域地质信息系统。

与会专家认为，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地下文物保护项目考古发现成果丰硕，在乌江下游沿岸有新石器、商周、西汉、两晋、唐五代、宋、明等不同时期的遗址，遗址数量多、时代跨度大、类型丰富，对该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以及该区域各时期聚落考古、环境考古、手工业考古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武陵关口西汉一号墓墓葬保存完整，随葬品丰富，出土漆木竹器以及墨书遗册等珍贵文物数量达600余件，为重庆地区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研究汉代早期丧葬制度、巴蜀文明融入汉文明进程、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资料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